



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

Four Topic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宋志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

Four Topic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宋志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 / 宋志明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748 - 4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近代哲学—研究—中国②现代
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50. 5②B26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5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75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总论：中国哲学新形态

第一章 在近代中国哲学开始转型	(3)
第一节 特定的语境	(3)
一 千年未有之变局	(3)
二 新式学人的出现	(5)
第二节 资源的扩大	(7)
一 西学东渐	(7)
二 西方哲学东渐	(8)
三 中西哲学会通	(10)
第三节 话题的更新	(12)
一 中国向何处去	(12)
二 客观世界如何解释	(13)
三 知识系统如何更新	(13)
四 人格观念如何更新	(13)
第二章 在现代中国哲学成为独立学科	(15)
第一节 学科意识	(15)
一 现代意识的自觉	(15)
二 对哲学的新认识	(18)
第二节 多种资源	(24)
一 固有的资源	(25)
二 外来的资源	(26)
第三节 基本格局	(29)

一	现代新儒家思潮	(29)
二	中国实证哲学思潮	(29)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30)
第四节	主要问题	(30)
一	人生价值观念如何树立	(30)
二	科学知识如何获取	(31)
三	中国社会如何改造	(32)
第五节	理论特色	(33)
一	时间短促，内容丰富	(33)
二	思想交锋，论战频仍	(34)
三	融汇中西，综合创新	(34)

近代专论：中西会通

第三章	关注进化发展	(37)
第一节	历史观转向	(37)
第二节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	(39)
一	生平与著述	(39)
二	从进化审视历史	(42)
三	从进化展望大同	(45)
第三节	严复的“天演之学”	(47)
一	生平与著述	(47)
二	进化的哲学意涵	(49)
三	以天演论醒世	(51)
第四节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	(53)
一	生平与著述	(53)
二	进化与革命兼容	(54)
三	进化的二向度	(56)
第五节	孙中山的“突驾”论	(57)
一	生平与著述	(58)
二	进化与天然力	(59)
三	进化与人为力	(60)
第四章	审视客观世界	(63)

第一节	本体论转向	(63)
第二节	康有为的元学	(66)
一	“元”为万物之本	(66)
二	“元”为价值的依据	(68)
第三节	谭嗣同的“以太—仁”说	(71)
一	生平与著述	(71)
二	“以太—仁”为本体	(73)
三	“仁—通—平等”的诉求	(76)
第四节	严复的“质力相推”说	(77)
一	本体不可思议	(77)
二	非质无以呈力	(78)
三	非力无以呈质	(80)
第五节	章太炎的二重本体论	(80)
一	前期的“阿屯”说	(81)
二	后期的“真如”说	(84)
第六节	孙中山的进化本体论	(85)
一	进化的物质过程	(86)
二	进化的精神层面	(87)
第五章 知行观念更新		(90)
第一节	知行观转向	(90)
第二节	谭嗣同的“贵知”说	(92)
一	贵知不贵行	(93)
二	转业识而成智慧	(94)
第三节	严复的“实测”说	(95)
一	从“夸多识”到“尊新知”	(95)
二	对经验原则的倡导	(98)
三	对逻辑原则的倡导	(101)
第四节	章太炎的“贵行”说	(104)
一	恃革命开民智	(105)
二	先行后知说	(106)
第五节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107)
一	知行的新内涵	(108)
二	知行关系新探	(109)
三	知行分任说	(112)

第六章 人格观念更新	(115)
第一节 人性观转向	(115)
第二节 康有为的“大同博爱”说	(118)
一 求乐免苦	(118)
二 博爱之德	(119)
三 大同之道	(120)
第三节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说	(121)
一 仁以通为第一义	(121)
二 冲决伦常之网罗	(122)
第四节 严复的人学思想	(123)
一 自强保种	(124)
二 合群之道	(125)
三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126)
第五节 梁启超的新民说	(128)
一 生平与著述	(128)
二 从维新吾民做起	(131)
三 破除心奴	(132)
四 树立公德意识	(134)
五 养成独立自由人格	(136)
六 发扬冒险尚武精神	(137)
第六节 孙中山的国民说	(139)
一 从进化的维度看	(139)
二 从互助的维度看	(141)
三 从大同的维度看	(143)

现代专论：综合创新

第七章 现代新儒家思潮（上）	(149)
第一节 概述	(149)
一 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起因	(150)
二 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发展历程	(155)
三 现代新儒家的类型	(168)
第二节 冯友兰的新理学	(172)

一 生平与著述	(172)
二 “理世界”本体论	(173)
三 人生境界说	(180)
第三节 贺麟的新心学	(186)
一 生平与著述	(186)
二 “心理合一”本体论	(187)
三 新式儒者人格论	(192)
第八章 现代新儒家思潮（下）	(200)
第一节 梁漱溟的新孔学	(200)
一 生平与著述	(200)
二 “大生命”的本体论	(201)
三 “三量说”的认识论	(206)
四 “三路向”的文化观	(209)
五 “求诸内”的价值观	(211)
第二节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215)
一 生平与著述	(215)
二 “体用不二”论	(216)
三 “性体呈露”说	(223)
第三节 唐君毅的超越论	(227)
一 生平与著述	(227)
二 “道德自我”本体论	(228)
三 心灵九境说	(229)
第四节 牟宗三的存有论	(233)
一 生平与著述	(234)
二 道德的形而上学	(235)
三 内圣开出新外王	(241)
第九章 中国实证哲学思潮	(244)
第一节 概述	(244)
一 发展历程	(244)
二 学术特色	(248)
三 相关的社会思潮	(253)
第二节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258)
一 生平与著述	(258)
二 关注工具理性	(260)

三	经验主义的实在论	(263)
四	工具主义的真理论	(266)
五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270)
第三节	丁文江的科学主义思想	(272)
一	生平与著述	(273)
二	发动科玄论战	(274)
三	科学万能论	(276)
四	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	(279)
五	唯觉主义与存疑主义	(281)
第四节	张东荪的多元主义认识论	(285)
一	生平与著述	(285)
二	质疑唯觉主义	(287)
三	非存在的感相与潜在的条理	(291)
四	直观的格式与判断的格式	(295)
五	经验的概念	(298)
六	以心为本位的中间阶段论	(300)
第五节	金岳霖的客观主义知识论	(302)
一	生平与著述	(302)
二	批评主观主义	(306)
三	所与是客观的呈现	(308)
四	纳所与于意念图案	(310)
五	思议原则和归纳原则	(314)
六	真假的定义和标准	(318)
第十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323)
第一节	概述	(323)
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323)
二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必然性	(329)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331)
第二节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与理解	(334)
一	生平与著述	(334)
二	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底色	(336)
三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340)
四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343)
第三节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论的传播与理解	(346)

一 生平与著述	(346)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高潮	(347)
三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	(348)
四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绍述	(350)
第四节 李达和艾思奇对新哲学的绍述与推广	(356)
一 生平与著述	(356)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高潮	(358)
三 李达对新哲学的规范化理解	(359)
四 艾思奇对新哲学的通俗化推广	(367)
第五节 郭沫若和侯外庐对新哲学的学术运用	(371)
一 生平与著述	(371)
二 郭沫若对儒学的同情与批评	(373)
三 侯外庐的儒学新论	(378)
第六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382)
一 生平与著述	(382)
二 迈入中国化的新阶段	(383)
三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创新	(384)
四 中国哲学的现代变革	(388)
 余论：续写新篇	
第十一章 接着讲	(395)
第一节 接着主线讲，坚持正确方向	(396)
第二节 回应中国实证哲学，化理论为方法	(398)
第三节 回应现代新儒家，化理论为德性	(400)
第十二章 讲新意	(403)
第一节 适应现代化，走自己的路	(403)
第二节 适应全球化，拓展发展空间	(405)
主要参考书目	(408)
后记	(411)

总论：中国哲学新形态

本书的起点为 1840 年，以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性事件；终点放在 1949 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性事件。按照通常的说法，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迈入当代阶段，已不属于本书陈述的范围。从 1840 年到 1949 年，共计 109 年时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算长，可是十分重要，因为处在在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对于这段历史区间应如何称谓，史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从 1840 年到 1919 年为近代，而从 1919 年到 1949 年为现代。现代的起点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性事件，终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性事件。另一种说法认为，从 1840 年到 1949 年，统称为近代就可以了，不必区分近代和现代，因为在这一历史区间，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殖民地状态。本书基本上采用前一种说法，认为还是把近代和现代区别开来为宜，故称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近现代”，并不是从“社会形态变迁史”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哲学思想演变史”的意义上说的。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确实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并且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仔细考察，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有比较大的差异，还不能笼统而谈，本书把近代专论与现代专论分开来评述。

从“哲学思想演变史”的视角看，有必要作“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区分。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哲学基本上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尚未受到西方哲学全面而根本的影响，可统称为“中国古代哲学”。16 世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曾对西方学术思想有所介绍，但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能改变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态势。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固然发生较大的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理论形态。佛教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系统，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并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佛教化，哲学思维方式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发生根本变

2 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

化。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故而我们只能做广义的哲学史陈述。1840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学涌入中国思想界。中国哲学不能再保持独立发展的态势了，哲学家必须同时运用中西两种资源进行哲学思考。所以，我们不能再沿用考察古代哲学的方式，必须采用新的考察方式。这时的中国哲学与古代相比，有了质的变化，故而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哲学”。不过，在五四以前，“西学”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虽然包含有西方哲学方面的内容，但还不是先进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他们心目中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制度设计、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在中国近代，哲学仍旧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处在从中国古代哲学向中国现代哲学的过渡阶段。对于这段历史，可以做专题性的陈述，仍旧难以做狭义的哲学史陈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已经完成理论形态的过渡，哲学在中国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这段历史，应称之为“中国现代哲学”，并且完全可以做狭义的哲学史陈述。

第一章 在近代中国哲学开始转型

1840 年以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讲哲学的资源发生了变化，讲哲学所涉及的话题以及讲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共同促使中国哲学发生转型。

第一节 特定的语境

对于近代以来讲哲学语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社会环境发生巨变，中华民族遇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不得不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二是讲哲学的讲者有了变化，新式学人逐渐取代“饱学之士”的位置，成为思想界的主角。

一 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撞开了清廷天朝大国的门户，使之无法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此，中国社会形态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动而迅速地迈入近代阶段。如当时著名思想家王韬所见：“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①对于王韬的这种说法，李鸿章表示认同，也有类似的说法。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竟然败在来自遥远欧洲的岛国，被迫签下南京条约，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这不能不使有识之士产生强烈的心灵震颤！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着急剧的转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促使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西方帝国主义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弢园老民刊 1898 年版，第 8 页。

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希望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意味着帝国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推动力，而只能成为阻力。对于新经济因素，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作为失败者，自然会萌生富国强兵的愿望，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现状。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洋务派做发展近代工业的尝试，做建立新式军队的尝试。光绪皇帝甚至接受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搞了短暂的“百日维新”。即便是作为顽固派代表的慈禧太后，1905年也不得不表示接受新政，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为改制立宪做准备。但是，清政府毕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因而对新经济因素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觉得手中的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扼杀。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当然不希望被人宰割，可是又拿不出御敌的良策，只得一次次吞下失败的苦果。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竟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甚至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诚如陈天华所说，清廷已经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两大阻力。不排除这两种阻力，中国社会不可能实现转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为最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形式上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其实，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破产的社会：旧体制已经失效，而新体制尚未建立起来。与此相应，旧的思维方式已经失效，而新的思维方式尚未成熟。处在这种语境中的先进中国人，必须努力探索建立新社会形态的途径，努力探索重铸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途径。不过，由于忙于解决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问题，他们来不及在哲学上做深入而细致的理论工作，不可能建立起完整而严谨的哲学体系。“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

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①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为中国哲学添加了新内容，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转型。

二 新式学人的出现

中国哲学在近代的转型，与新式学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倘若没有新式学人的出现，哲学转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哲学转型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新式学人队伍在近代成长的情形。

中国近代新式学人出现于 1860 年前后。他们当中有洪仁玕（1822—1864）、容闳（1828—1912）、王韬（1829—1897）、冯桂芬（1809—1874）等人。洪仁玕曾与族兄洪秀全策划起义，事发后逃往香港。在港期间，他结识传教士理雅各，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1859 年，他辗转来到天京（今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他写出《资政新篇》，呈送洪秀全，建议实行改革，大力发展工商业，与西方国家通商，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准许私人投资，承认专利权，要求把太平天国建成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洪秀全读后，表示出相当的认同，做了许多批示。可惜，当时的天国已无法把洪仁玕的这些设想付诸实施了。容闳 1854 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5 年回国，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归来的新式学人。1860 年，他向洪仁玕提出武备、政制、银行、教育等 7 项改革建议，得到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认可，可是并未实施。1863 年，他又找到曾国藩，试图借助这位“中兴名臣”，实现自己“西学东渐”的理想，也没有成功。另一位有影响的新式学人是王韬。他曾在外国人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当过 10 年编辑，有深厚的西学学养，也分别向清廷官吏和太平天国提出过改革建议。再一位有影响力的新式学人是冯桂芬。他撰写《校邠庐抗议》，批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吏治、科举等弊端，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变法。他后来投身洋务运动，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急需的人才，开办了一些洋务学堂，还采取了派遣留学生等措施。1862 年，奕䜣在北京建立同文馆，李鸿章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文馆。1870 年，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派出官费留学生，获得批准。1872 年，第一批学童官费留学生被派往美国，其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读到大学毕业，大部分人未及学成便被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3—1514 页。

回中国。从 1875 年到 1885 年，中国政府还派遣六批成人留学生到西欧英、法、德等国学习，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就在其中。由于这些举措，新式学人的队伍逐渐扩大。

1895 年甲午战败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应试的一批年轻举子，疾首扼腕，慷慨激昂，他们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动下，联合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要求拒绝和议，提出振兴国力的种种构想。从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新式学人已经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

1898 年，戊戌变法仅行百日，便被慈禧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在菜市口，为改革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康有为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全部被废止，可是兴办新式教育这一项居然被保留了下来，京师大学堂以及其他新式学校得以继续办下去。新式学人队伍增长的态势，并未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衰弱，反而有所加强。1905 年，清政府颁布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 废除科举制度，也就等于砸碎了培育旧式学人的温床，接受新式教育便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于是涌现出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由于日本离中国较近，费用较低，大部分留学生选择了日本。据统计，1900 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有 100 人左右，可是到 1906 年，竟激增到 15000 人以上，翻了上百倍。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避难于日本，孙中山、章太炎也选择日本为居留地。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新式学人最集中的地方，遂形成了适合于讲中国近代哲学的语境。他们在那学习和研究西学，组织政治团体，办刊物，写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或革命活动，思想十分活跃，对学术研究亦抱有极大热情。改良派的主要思想阵地是《新民丛刊》，梁启超担任主编；革命派的主要思想阵地是《民报》，章太炎担任主编。在旅日的新式学人中间，涌现出一批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朱执信等人。他们都曾为推动中国哲学转型做出过贡献。

尽管大部分新式学人的领袖人物皆在国外，然而，他们的思想影响却主要发生在国内。他们在国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使中国人的思想面貌逐渐发生改变。这就为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哲学最初只是少数新式学人的哲学话语，后来则逐渐得到普遍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66 页。